劳动何以可能

——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本体论反思

曾 俊
(云南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本体论是对“存在”何以可能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寻求对现实事物的超越性理解。近代以来哲学家对作为“现代社会范畴”的劳动进行了批评性的哲学反思。马克思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劳动何以可能”这一本体论问题。其运用历史性与辩证性的批判方法,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的抽象、片面理解,同时又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证性、科学性,克服了黑格尔哲学中对劳动本质的唯心主义阐释。从而在唯物主义视域内实现了对劳动问题的本体论反思,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人类解放”的意蕴。

[关键词] 本体论; 时间性劳动; 空间性劳动; 对象性劳动; 非对象性劳动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6-0067-08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开篇就指出,作为“最广泛、最深刻、最原始”的哲学问题,本体论(Ontology)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追问“在者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在者照何根据行事”[1]。这意味着,所谓“本体”不是“在者”(seiendes)本身的“规定性”,而是“在者”何以为“在者”的“依据”,易言之,本体论问题就是追问“在者”的“何以可能”的问题。对劳动问题的本体论反思就是探究现代社会中“劳动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继承了前人的批判并创造性回答了这一问题,从而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一 “劳动是什么”: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展开

劳动(arbeit)自人类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但将劳动作为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这种反思首先是从对“劳动是什么”问题的回答开始。近代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一直遵循着两条路径,一条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路径”,将劳动定义为“不仅仅包括一个人为从事某项具体工作所消耗的脑力和体力,或者二者本身,还包括与其相联系的所有不愉悦感、所有的身体上的不舒适感或者精神上的烦恼”[2]。而与之相对,对劳动问题进行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也就是哲学反思路径——则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3]。黑格尔哲学中对劳动辩证法的阐释就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努力,其目的是寻求对劳动问题的本体论理解。

黑格尔曾经明确指出,“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4]。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existenz)一方面作为“一切皆在”,乃是万物得以“持存”(halten)的始基。同时在另一方面,存在又是一种祛除了事物全部规定性的“纯有”(rein),他认为先于一切规定性的“纯有”就是人纯粹的“思维”,由此黑格尔确认了“思想”相对于客观存在的“逻辑先在性”,因为任何事物在确立自身存在的具体规定性之前,都必须以“思维”对“存在”本身的确认为基础。也因此,黑格尔认为对现实中任何具体的存在依据的溯源必须从“思维”出发,对劳动问题的本体论反思也概莫能外。

基于“思维”相对于“存在”的“逻辑在先”出发点,黑格尔将劳动首先理解为一种在精神领域的辩证运动。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formieren)事物”[5]189。这说明,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劳动一方面使意识通过

[收稿日期] 2018-10-29
[作者简介] 曾俊(1982-),女,云南会泽人,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陶冶”而“在劳动中外在化了自己”,同时也在“陶冶”过程中感受到了意识本身所特有的“否定性”以及其自身的“自为存在”(fürsichsein)。简言之,黑格尔认为人的劳动在“陶冶”外在事物的同时也在“陶冶”自身。

但劳动的“陶冶”活动不仅仅只是“塑造”外物与人本身的关系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看到了劳动活动在“塑造”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详细论述了围绕劳动这一活动所造成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辩证关系运动。首先,主人意识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而奴隶意识是“依赖的意识”。但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人必须通过劳动改造物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则是“主人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它就只把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他把对物独立性的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5]186-187因此,奴隶节制自己的欲望,从而“陶冶”事物,而主人享受物,满足了自身欲望,由此在劳动活动中,主人以奴隶为“中介”陶冶事物。但在这一过程中,主人间接地与事物发生关系,在主人意识完成之时,从人与物关系的角度分析,主人已经不能独立与物发生关系,而只能借助于“奴隶”与物发生关系,此时的主人意识已经成为一种“非独立”的意识。与之相反,奴隶的意识由于直接与物的独立性一面相关联,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具有了独立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独立的意识的真理乃是奴隶的意识”[5]188。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在人与物关系的的层面上,最终实现了地位的转换,由此形成了劳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辩证运动。

因劳动而形成的主奴关系的转换,并不是劳动辩证法的终点。黑格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论证了人的劳动活动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建构作用。

在黑格尔晚期的《法哲学原理》中,一方面在对“所有权”“市民社会”等问题的论述中更为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劳动概念,同时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刻阐述了劳动在历史中的建构运动。在黑格尔看来,从现代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劳动是不可或缺的“中介”。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体系”,一方面具有主观的对物的特殊需求,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外在物”。劳动是沟通二者的重要“桥梁”——劳动作为特别化了的需要和手段的中介——是一种普遍形式,因为“我”从“他人”中获得满足,同时“我”也要为满足“他人”而劳动,无论是需要还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都成为了“为他人的存在”。这意味着一切人都必须是“为了”他人而存在,同时一切人也都必须“依赖”他人而存在。

在“市民社会”这一需求体系中,劳动是满足人群共同体各种“特异化了的需要”的“中介”。既然在社会中人的劳动是“为了他人”而进行的劳动,因此个人的私人劳动由此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形式——“我即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我就得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同时我也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于是彼此配合,相互联系,一切个别的东西就这样成为社会的。”[6]207但个人劳动获得社会的普遍形式还不是劳动在人与人之间关系领域辩证运动的终结,劳动在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塑造了人与人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制度。在黑格尔看来,在人的劳动的普遍形式的抽象化过程中,产生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6]210,而分工导致市民社会因分享财富而产生了众多部门。同时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等级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私人虽然都是利己的,但他们有必要把注意力转向别人,这里就存在着一种根源,它把利己心同普遍物即国家结合起来,而国家则必须关心这一结合,使之成为结实和坚固的东西”[6]212。据此而论,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划分为 3 个等级:实体性的等级、反思或形式性等级以及普遍等级。区分这 3 个等级主要依据是通过其劳动形式,实体性等级的劳动以农业劳动为主要形式,反思性等级的劳动以对自然物加工为主要劳动形式,而普遍等级以为社会提供普遍利益的劳动为其形式。由此,不同性质的劳动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等级。至此,黑格尔通过劳动将人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建构活动、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外在创建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表征为一个统一的人的精神从“无”到“有”的辩证逻辑运动过程。

然而,作为第一个将对劳动的理解提升到反思层面的哲学家,黑格尔对于劳动问题的本体论反思与其说是“在任性和单纯的需求之表面上偶然的喧嚣之中认识到了合理的必然性”[7],不如说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们敞开了更为广阔探索乃至于争论的理论空间。

首先,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说,黑格尔的确将劳动视为人精神意识的外化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与

物的关系被“重建”,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性被不断地扬弃,同时人在对自然物的“陶冶”过程中,其生存方式在时间与空间层面上都得到了扩展,从而能够不断建构出自身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只有人将劳动放置于其欲望与满足之间,只有当他突破了自然人的本能的直接性,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8]325。但与此同时,黑格尔对人主体性的强调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强调,其核心仍然是将人与自我意识相等同——这也是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典型理论特征。也因此将人的劳动简单指认为“精神性”的活动,而劳动的对象对于黑格尔来说仍然是无足轻重的“质料”,同时强调劳动对象的“易逝性”,从而消解了劳动对象的现实性。使得黑格尔对劳动的反思被限制在了精神与思辨领域。那么,在内在思辨领域如何阐述外在现实中的劳动?

其次,从现实性角度而言,黑格尔确实试图从市民社会的现实背景中来理解劳动。从《精神现象学》到《法哲学原理》,我们看到黑格尔在强调劳动对物的塑造的同时,也强调了劳动在国家法权、社会关系、等级制度上的建构作用。对现实的强调贯穿黑格尔劳动问题阐释的始终,但问题在于这种强调是一种“非批判性”的强调。黑格尔将自我意识视为人的真正本质,认为精神是现实世界的真正“本源”,将法权、政治、等级等现实活动视为人精神的外化,同时又认为生活在哲学“外化”活动中的个人能够通过这些活动理解生活的本质。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关系、政治结构、法权制度、伦理规范、社会等级等实存都是人精神外化的产物,因此在黑格尔的理论视野中不存在阶级对立问题。故而卢卡奇总结了黑格尔政治哲学思想中的两个缺陷:第一,“他(黑格尔)没有能够将阶级结构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第二,“他没有能够将阶级结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8]387。总之,黑格尔试图将非批判性的实证主义与非批判性唯心主义通过辩证法连接在一起,对社会现实形成一种非批判性的哲学阐释框架。

主体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始终存在。从主观的层面上看,精神主体“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9]。从现实层面上看,黑格尔仍然以一种内在的,主观的视角来“解释”现实问题。从而无法穿越外化精神的表象,发现其中客观的现实社会联系。最终,黑格尔只能诉诸于“神秘化”了的主体-客体的精神性辩证运动来解决这一矛盾。

黑格尔对劳动阐释的本体论基础,是将作为思维对象的“在者”的规定性全部“蒸发”,从而获得作为“纯存在”的“存在者”的最高抽象,并以此为出发点把握客观事物的存在。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思维以“概念”的逻辑运动来“表征”存在者的现实运动。因而在劳动辩证法中,黑格尔紧紧抓住劳动作为人精神活动的“外化”(entäuβerung)这一出发点,将人的现实劳动表现为概念逻辑的辩证运动。因此,“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10]。但是黑格尔从思维到存在的本体论反思路径,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劳动辩证法中存在着主体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尖锐对立,这表现为虽然黑格尔对劳动问题的反思创造性地引入了辩证法,并将劳动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定在”(dasein)。但同时由于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框架,其对劳动的本体论反思仍然停留在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反思维度内——也就是停留于对“劳动是什么”问题的思考中。由此可见,本体论层面上研究思路的“颠倒”,使得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批判性、革命性与超越性本质被“窒息于”唯心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

二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本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定向”

黑格尔对“劳动”问题本体论反思所得出的“劳动辩证法”,其理论意义在于以“辩证思维”取代了传统本体论哲学“形而上思维”,展开对劳动问题的辩证性、过程性的反思,这一点为之后的马克思所继承。但马克思没有止步于对辩证思维方法的继承,而是更进一步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马克思强调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是人类“本质”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自然界相对于人类精神“逻辑先在性”的具体体现。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 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部分。马克思对观念论辩证法批判的关键之点在于,“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

在",存在就是存在者自身的现实生活过程,而不是存在者自身精神生活过程的展开。从哲学意义上理解人类劳动的前提首先是厘清"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理论"定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对劳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定向"。

首先,马克思强调"存在"对于"意识"的优先性地位,认为劳动得以实现的前提首先是客观自然界的存在。马克思在《44 手稿》中就明确指出,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的活动相对于黑格尔所主张的自我意识的"精神性活动"具有优先地位。这种肯定立足于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基础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将哲学对于现实的反思局限于"思维领域"。这一哲学研究路径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自我意识设定外物的基本哲学"建制",使得对象乃至客观世界本身在思维意识领域中成为一个偶然性、暂时性与易逝性的存在。费尔巴哈就是针对黑格尔哲学对象性的"虚化"而展开批判,因此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并且"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11]157-158。但马克思显然没有满足于费尔巴哈的批判水平,希望进一步恢复"对象性存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核心地位,但同时又要避免堕入到机械唯物主义的陷阱中。因此马克思在《44 手稿》中既没有彻底否定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性",也没有全盘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试图统一"对象性"与"主体性"。"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1]167。也就是说,人作为"主体"设定外在、异己的"对象"时,恰恰是其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本质特征,因而人的主体性的活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活动。由此,马克思在《44 手稿》中指认了"对象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并试图藉由这种"统一"打破一直困扰现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问题。

其次,意识发端于存在,同时通过劳动再次"复归"到现实之中。虽然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对劳动的哲学阐释站在了不同的出发点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全盘否定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相反,马克思却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163在这里马克思高度肯定了黑格尔对劳动"陶冶"外物同时也"陶冶"人自身的看法,在马克思看来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劳动,并将这一过程看做是人自我生成的过程——这成为黑格尔劳动辩证法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方面。但同时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使得劳动无论是对外物的"陶冶"还是对人自身的"塑造"都被局限于精神领域。这意味着黑格尔将本来"发端于"现实之中的意识看作是人类精神自身产物。认为人的劳动是精神外化到现实世界的"中介",而这种外化活动最终也将在精神世界达到自己的终点。与之相对,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辩证理解是在对象性的领域展开,将"属人"的现实世界作为人精神活动的出发点、立足点与最终落脚点。因此,对象世界不能再被视为人精神世界"异化"的产物,人重新占有自身的本质也不能被看做是对对象性的"扬弃"。恰恰相反,人是从自己的对象性活动——而且是历史性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塑造自身本质的。因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1]168。人同时也是在对对象世界的改造过程中——"对象性活动"或"实践"活动中——塑造自身。所以,劳动的辩证法不再是人思维领域的辩证认识过程,而成为人在实践领域中的自我实现过程。人的劳动一方面是精神的外化活动,但同时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基于对客观现实反思的产物。由此成为精神意识的客观性立足点。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存在出于精神并通过劳动最终"复归"于精神。而马克思则颠倒了这一思路:存在在劳动中塑造意识,而意识又通过劳动再次"复归"于现实。

最后,劳动对现实的建构不是精神的"外化"与"展开"过程,而是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相互作用历史过程的产物。如前所述,黑格尔对于劳动概念本体论阐释的一大贡献,是将人的劳动与人类社会结构的"塑形"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对劳动的理解突破了单纯的经济学的"实证思维"论域,而上升到了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反思思维"的层面上。但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框架始终限制着其对劳动问题的理解,因此马克思在《44 手稿》中评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11]172也就是说,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中,劳动塑造现实社会的制度、法权的活动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运动所展开,而不是通过现实的对象性活动所实现的。这在马克思看来不是黑格尔认识局限之所至,而是整个黑格尔哲学“原则的谎言”。反过来,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11]169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认为劳动对于社会制度具有塑形的作用,但与黑格尔那种强调精神外化塑型社会制度的观念论思维方式相反,马克思强调人的精神只有在自己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才能够“确证并表现自身”。现实的社会制度不是从人的精神世界中“外化”而来,而是人在适应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出来,并反映到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的历史过程。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自然成为了“人的自然”的同时,人的精神也获得了现实的内容。所以就劳动而言,其不再是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而成为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产生的真正“本源”。这一论断再次确认了现实存在相对于精神的优先性,但同时又肯定了“有意识”的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这意味着劳动的主体性在实践范畴中被保存了下来。

《44 手稿》中马克思为阐释劳动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本体论“定向”,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出黑格尔辩证法的中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的“真相”,更在于为阐发劳动概念奠定了唯物主义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劳动的本质。同时,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劳动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因而,劳动本质特征是在有限现实中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无限可能性的“现实化”不是在精神领域中通过概念的逻辑运动而实现,而是在外在客观世界中,通过将自在自然不断“转化”——从而使其成为“对象化”的“自为自然”——的实践中实现。

三　“劳动何以可能?”:《1857—1858 经济学手稿》对劳动本体论问题的阐释

马克思在《44 手稿》中实现了对劳动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定向”。而经过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 手稿》)中马克思又有了对劳动问题的新的理解,这一理解形成了马克思对劳动本体论问题的系统阐释。这种阐释不是以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s)形式实现的,而是在批判性反思“劳动”在现代社会得以实现的依据和基础而实现的。也就是将“劳动是什么”的问题转化为“劳动何以可能”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对于劳动本体论问题的研究是以对“现实矛盾”的揭示与扬弃为基础,“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12]。因此在阐释劳动的本体论问题时必须从现实的、历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故而马克思在《57-58 手稿》中对劳动问题的本体论阐释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理解,一个方面是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中加以理解。同时,另一个方面是在现代社会资本关系中展开对劳动本质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说,在《57-58 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马克思认为基于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研究,走的是一条从“实在和具体”开始,最后以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关系为终点。这种方法得到的所谓“抽象规定”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当做历史上“一以贯之”的经济原则。同时,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基础的黑格尔,也在此问题上“陷入幻觉”,也就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这些经济原则,以思维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得出这些所谓的“永恒经济原则”乃是人思维“外化”“异化”的结果的“幻觉”。这种“幻觉”的产生根源于观念论哲学的认识论基础,也就是“在意识看来(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13]38-39。

基于对此问题的反思,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

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13]42,这说明劳动只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才可能实现自身。因此回答"劳动何以可能"必须首先将劳动放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进行理解,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处于现实历史进程之外的抽象概念来加以反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就是人用自己的自由去换取生活资料的"商品",因而劳动就是"不自由"的象征——"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14]112-113。另一方面,对于黑格尔而言,虽然认为人的自由奠基于劳动,但黑格尔所指认之自由是人在自我意识与精神领域中的自由,而在现实层面上,黑格尔仍然认为劳动是对人欲望的一种"限制"。马克思与二者的不同在于始终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看待劳动问题。马克思始终认为,劳动与自由的对立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的规律,虽然劳动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但这一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关系中才具有不同的内涵:"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13]43。

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特定的经济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劳动的内涵。同时"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13]44。换言之,对现代社会劳动的理解不能脱离开现代社会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理解,也就是对"资本"这一社会关系的理解。由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3]45。因此,资本关系对于资本社会所具有的一切经济范畴而言都有一种"逻辑先在性",在阐释现代社会"劳动"概念必须将其"置入"资本关系范畴加以考量。

在资本关系中,劳动首要特征是"抽象化"。"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arbeit überhaupt),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13]118-119。但在劳动的抽象性之中,马克思敏锐把握到劳动在时间性与空间性层面上的对立。从空间性上说,资本作为一种"积累劳动",是过去了的劳动、或者说是"物化了的劳动"——"物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从时间性上说,工人所拥有的劳动是一种潜在的"能力",这种作为"能力"的劳动与物化了的劳动不同,只能存在于主体之中,作为主体的一种时间上的"可能性"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13]228。物化劳动作为空间形式上的劳动是一种"无人身"的存在,而时间上的劳动作为主体性的创造性活动,却不能脱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同时在另一方面,主体的"活劳动"作为时间性的存在,又必须与现实中空间性的劳动——也就是积累的劳动——如原材料、劳动工具——相结合才成产生出具体的劳动产品。这意味着非物化劳动只有与物化的劳动相结合才能完成劳动的整个过程。在此情况下,原本劳动属于工人本身的原则在资本社会中被扬弃,工人的劳动必须同"过去了的劳动"相结合才能实现,由此导致工人本身与劳动所有权、劳动产品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也就是说,工人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主导权与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同时,这种"分离"表现为非对象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之间关系的对立,这一对立形成了劳动的在资本关系中的第二个特征——即劳动的"对象性"特征。马克思认为资本关系中的劳动都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劳动,而人本身的劳动是一种"非对象性"的劳动。对象化劳动作为资本的另一种形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微观的生产过程角度来看,"物化劳动本身在与活劳动的关系中又表现为原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从宏观的整个资本社会生产过程而言,对象化劳动又表现为非对象劳动的前提与条件,因为现代劳动产品的复杂性导致了生产工序的不断增加,几乎没有一件劳动产品能够在单个劳动者的能力范围之内完成。因此,在现代工业劳动中,"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或者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作为使用价值被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发生了变化"[13]332。这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只能以作为资本的对象性劳动才能展开。反过来看工人所拥有的作为"活劳动"的非对象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非对象性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真正现实性的这些

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时也是“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13]252-253。同时从另一方面而言,正是由于劳动的这种“纯粹主体性”,使得劳动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活动——或者说财富的一般可能性,与作为现实财富的资本相对立,成为资本赖以创造更大财富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必须将非对象性劳动转化为对象性劳动才能实现对人的活劳动的支配。

至此,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方面来说,时间性、易逝性的“活劳动”必须同空间性的“积累的劳动”相结合,才能实现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是作为劳动得以实现的前提而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就是从对象性与非对象性角度而言,对象性劳动也就是资本本身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反过来资本若不能创造财富,实现自身增殖,则无法实现自身本质,只能作为一般货币财富而存在。而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关键在于对他人活劳动的支配。也就是说,活劳动同时也是资本实现自身的前提。由此,资本与劳动之间形成了互为前提的状态,马克思将此比喻为“面粉与酵母”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57-58 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对劳动与资本辩证关系的揭示,而是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对立基础之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能的实现形式进行了探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技术的发展不会使劳动者获得财富,相反却会使劳动者的活劳动更进一步陷入资本的支配之下,“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13]268但资本本身除了与劳动之间存在矛盾之外,其本身也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因为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中,“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4]219。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不断缩短人的活劳动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同时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由活劳动所控制的对象性劳动——也就是物化劳动的量。与此同时,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最终不得不在客观上形成一种不断减少劳动者劳动时间,从而使劳动者获得更多自由的状态。此时,对于劳动者来说,自由的时间就不再处于劳动时间的对立面,而且“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4]222。至此,劳动与自由在现实意义上实现了真正的统一,贯彻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的劳动与自由的对立就此被扬弃(positive aufhebung),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文明的全新形态——也就是劳动成为人生活“第一需要”的社会形态。

可以说,在对“劳动何以可能”问题的回答中,马克思不仅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问题的机械式的理解,而且真正实现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和解”。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与自由是“永恒对立”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实现了黑格尔劳动辩证法未能实现的目标,揭示了劳动与自由之间如何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辩证运动。由此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以及对现实社会资本与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揭示,真正为我们指明了实现“劳动”与“自由”在现实中统一的“未来之路”。

四　结　语

本体论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学说——而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对其的本体论阐释就是追问“人的劳动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问题的本体论反思,以辩证批判的形式“表征”了现代社会中以资本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其深刻指出正是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被确立了起来。因此,马克思在反对将劳动视为人类社会“永恒原则”“绝对真理”的传统本体论哲学“幻想”的同时,也展开了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现实劳动的本体论反思。而后者的反思成果恰恰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价值论研究、剩余价值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点,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现哲学批判、并继而引发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 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

[2]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M].金 镝,金 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

[3] [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38.

[4]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 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11.
[5]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 麟,王玖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 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7]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65.
[8] GEORG LUCKACS. The young Hegel[M].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Isle of Dogs,197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32-333.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1.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 孙正聿.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J].哲学研究,2016 (6):19-27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How Can Labour be Possible?

——Marx's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n labor issues

ZENG Jun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Ontology is not only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but also a transcendental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In modern times, philosophers have carried out critical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labor as a category of "moder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his predecessors, Marx creatively answered the ontological issue of "how is labor possible". His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criticism breaks through the abstract understanding of labor in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 uses political economy to study the empirical and scientific nature and overcomes the ide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labor in Hegel's philosophy. Thus, the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n labor issues has been realiz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sm, and the implica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has been endowed in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ontology; temporal labor; spatial labor; object labor; non-objective labor